

淺談中國傳統輿圖繪製年代的判定以及偽本^①的鑒別

成一農

內容提要：本文通過分析認為，某些中國傳統輿圖的繪製時間難以使用常用的方法來判斷，這種情況的出現與中國傳統輿圖的繪製習慣有關。這種繪製習慣也為中國傳統輿圖的造偽提供了便利，而且現在確實也發現了一些存在造偽可能的地圖。本文雖然提供了一些辨別造偽地圖的方法，但這依然是今後中國傳統輿圖研究中需要解決的問題。

關鍵詞：偽本 傳統輿圖 辨偽 繪製時間

對地圖年代的判定，是中國傳統輿圖研究的基礎。不過，首先要明確與地圖年代有關的兩個概念：地圖所表示的時間，和地圖的繪製時間。這兩個概念很好理解：地圖所表示的時間，即地圖繪製內容所表現的時間；地圖的繪製時間即繪製輿圖的時間。但是，對於某些中國傳統輿圖而言，在具體研究中這兩個年代都是難以輕易斷定的。這一點李孝聰教授在《歐洲收藏部分中文古地圖敘錄》的前言裏也已經指出“對於本世紀（筆者注：指的是20世紀）以前繪製的中國地圖，最困難的工作是判斷其製作的年代和圖面內容所反映的時代。由於大多數明、清地圖的圖面上既不具編繪年代，也不署繪製人或刻工的名字，尤其是那些坊間私刻本和摹繪本。至於某些官繪本地圖的圖題和題識題款，往往採用貼籤，或書於裱拓之首尾，或書於裱軸背面，常常已經失落，或漶漫不清。因此，這些地圖的繪製時代只能依據圖面內容來判識”，並總結出了四種判識的方法，即“利用不同時代中國地方行政建置的變化”，“利用中國封建社會盛行的避諱制度”，“依靠歷史地理學的知識”，“借助國外圖書館藏品的原始入藏登錄日期來推測成圖的時間下限”^②。其總結的判識方法非常具有實用價值，對於絕大多數輿圖也是適用的。

但是中國傳統輿圖，與現代對於地圖表現時間的要求可能有些差異，對於地圖所表達的時間有時並沒有嚴格規定，因此在地圖上可能會出現時間上相互矛盾的地理要素。如《地理圖》，一般認為作者是南宋的黃裳，從圖中“大名府北京”、“開封府東京”等地名來看，該圖主要表達的是北宋時期的行政區劃。這種對北宋行政區劃的表示，也符合黃裳繪製該圖的意圖，即為了讓寧宗看到北宋時期的江山“亦有所感發”。但從現存《地理圖》的石刻來看，該圖在上石前曾經根據當時的行政建置情況進行過修改，如成都府路的“嘉定府”，本為嘉州，慶元二年（1196）因為是寧宗的潛邸而升為府；

利州路的“沔州”，本為興州，開禧三年（1207）改為沔州；潼川府路的順慶府，本為果州，理宗寶慶三年（1227），因理宗潛邸而升為府。因此，該圖所表示的時間是不統一的。再如《華夷圖》，一些學者根據圖名《華夷圖》、圖中文字注記“四方蕃夷之地，唐賈誼公圖所載凡數百餘國，今取其著聞者載之”，以及圖中黃河下游河道的走勢認為這幅地圖很有可能來自唐代賈耽的《海內華夷圖》。但是從圖中內容來看，四周的文字注記大部分應當是宋人所寫，圖中的行政建置都是宋代的，某些河道表述的也是宋代的情況。最為典型的就是東京（今河南開封）附近的河道，其流向東南的兩支在唐代是沒有的，應該是宋代開鑿的惠民河和金水河，因此該圖所表現的年代也是不統一。類似的還有《禹跡圖》等。出現這種情況主要是因為中國古代在某些情況下會以某幅地圖為基礎根據現實需要進行部分改繪，但又沒有通過文字注記進行說明，而且很可能不像今天對於地圖表示的時間有着統一的要求。

地圖的繪製時間更為複雜，除了少量注明具體繪製時間的地圖之外^③，以往對於地圖繪製年代的判斷也大都依據地圖上繪製的地理要素所表現的時間，但是有些地圖的繪製過程較為複雜，也許是根據以往資料繪製的，也許是根據其他地圖改繪、摹繪的，也許是後世根據前代地圖摹繪的等等，因此判斷起來非常困難。這方面也有一些例證：

如收藏在美國國會圖書館的《大明輿地圖》^④通過將《大明輿地圖》中的“輿地總圖”與《廣輿圖》中的“輿地總圖”進行對比，會發現兩者存在很多相似之處，如山東半島、遼東半島的形狀，黃河源的形狀，甚至黃河的形狀也非常相似，而且“河套”兩字附近，黃河河道與方格網交匯的位置也都一致。海南島的形狀，北方沙漠的形狀、走向以及附近幾個湖泊的位置，甚至圖中右下角的注記文字都相同，只是在具體地名標繪的位置上存在稍許差異。分幅圖的數量，兩者也幾乎相同，《大明輿地圖》多出了山東輿圖的遼東部分，但《廣輿圖》中有“遼東邊圖”。就具體分幅圖的繪製來看，兩者也都大致相同，如《廣輿圖》和《大明輿地圖》中的“廣西輿圖”，兩者府衛邊界的走向繪製得大體相同，河流的走向，甚至地名標繪的位置也都大體相當。因此，《大明輿地圖》與《廣輿圖》之間不單單是簡單的參考關係，而可能具有前後承襲的關係。《廣輿圖》的刻繪時間，據任金城考訂，當在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前後。廣東四會縣分置會寧縣是在嘉靖三十八年（1559），《大明輿地圖》中沒有表示；福建大田縣置於嘉靖十四年（1535），圖中已經體現。由此《大明輿地圖》所表現的時間與《廣輿圖》應當大體是一致的。^⑤此外，雖然《山東輿圖二·遼東圖》並不包括在《廣輿圖》的政區圖中，只是與“遼東邊圖”近似，但是從長城、河流的走向，以及地名標注的位置來看，兩者大致相同。只是《大明輿地圖》“遼東圖”中地名的數量遠遠少於《廣輿圖》的“遼東邊圖”。而且由《廣輿圖》各版本中的序言來看，《廣輿圖》的繪製在當時是一件衆所周知的事情，羅洪先應無抄襲《大明輿地圖》的可能。因此基本可以肯定《大明輿地圖》是根據《廣輿圖》的刻本彩繪的，繪製時間應該是在嘉靖三十四年之後。此外，從圖版形式、計里畫方的方格網的形狀以及黃河源的繪製方法，尤其是“輿地總圖”中沒有繪製長城的情況來看，該圖應是根據萬曆七年（1579）錢岱刻本之前的某一版本摹繪的。

又徐光啓撰於明崇禎年間的《新法算書》卷十六載“《大明輿地圖》，以方格限里數。查自順天府至應天府二千二百里，至杭州府二千七百里，至南昌府三千里，至廣州府四千八百里”。《大明輿地圖》按照計里畫方計算，所標示的距離正好與此記載相合，因此二者當為同一幅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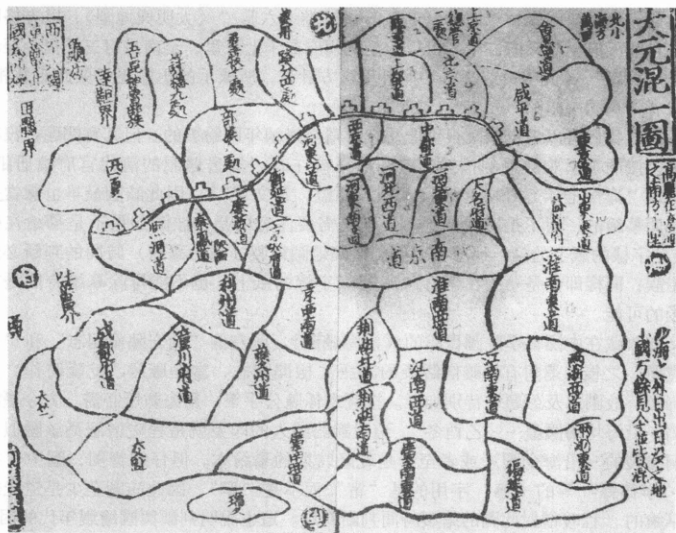
由此，我們可以推定該圖很可能是在嘉靖至崇禎年間繪製的。但其實問題並沒有完全解決，按照李孝聰教授的描述，該圖被裱糊在有“墨書題記的清代官府檔冊紙上，其中出現‘康熙七年五月初上納’、‘南陽縣監’等文字”^⑥，因此該圖最早也應當是在康熙年間摹繪的，而不是明代的地圖。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該圖如果不是摹繪在帶有“康熙”字樣的紙上的話，那麼我們對於這幅地圖繪製（或者摹繪）時間的判斷必然會產生錯誤；同樣即使是摹繪在帶有“康熙”字樣的紙上，也不能排除摹繪時間是在康熙之後的可能。

又如收藏在中國科學院圖書館的《沿海總圖》，圖左側“同安陳倫炯志”和“長洲彭啓豐題”之後，還附有程峻僧觀後的識語“檢閱圖志，當是康熙、乾隆時作。其時臺灣歸順，故圖志及彭題均特別加詳。按圖志係陳公手筆，為海防所必需。方今臺灣收入版圖，沿海均屬國疆……乙酉冬”。這段識語給人的印象就是程峻僧認為該圖似乎是陳倫炯繪製的《沿海全圖》或者至少是乾隆時期的摹繪本。但仔細審閱，圖中“福寧府”、“寧德縣”等的“寧”字用的是“甯”而不是“寧”，因此該圖至少是道光或其之後摹繪的。^⑦程峻僧對此圖的繪製時間判斷有誤。這也說明判斷輿圖繪製年代的困難。

由於根據圖中內容進行的判斷，只能斷定地圖所表示的時間，並不一定能確定其繪製時間，由此進一步延伸就涉及現存古代地圖的真偽問題。除了個別地圖之外^⑧，當前研究中對於所見到的，尤其是收藏在海內外藏圖機構的中國傳統輿圖較少考慮其真偽，也很少考慮到其圖名和地圖所體現的繪製時間是否是真實的。但如同古籍，地圖有意無意的造偽早已有之：

如南宋陳元靚所撰《事林廣記》收入的《大元混一圖》，從繪製內容上看，應當是一幅南宋、金、西夏時期的全國總圖。從地域上看，元代的疆域也遠遠超過這幅地圖所標示的範圍。在地圖西側標明的“回鶻界”、“吐蕃界”、“韃靼界”，顯然也是南宋時期的名稱和邊界，如果是元代的地圖當不應如此標識。因此，該圖有可能是元代民間書坊在宋代輿圖的基礎上，經過修改起名為《大元混一圖》後補入的。

又如日本宮城縣東北大學圖書館藏的《北京城宮殿之圖》，圖中一些建築上附有文字注記，如午門前注有“此丹墀端門至午門直八十丈長，橫六十四丈”；在左右腋門後的建築中分別注有“朝房二十八間”、“朝房二十間”等。從形式上看，這些注記較為正式，似乎應當是一幅官繪本的地圖。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地圖上端有一首敘述明代皇帝承襲順序和在位時間的歌謠，圖中奉天殿以及午門之前還繪製有一些類似於戲劇人物的畫像；圖中還存在一些非常明顯的錯誤，如將“安定門”寫為“東安門”、“海運倉”寫為“海雲倉”等等。這些都帶有民間繪製地圖的特點。初看這似乎是一幅明代的北京城圖，但這只是在理想狀態下的判斷，因為還存在另一種可能，即後來的書商，將一幅未標注時間的北京城圖與一首帶有萬曆年號的歌謠結合在一起，並添加了一些內容後出版，用以冒充萬曆時期的地圖。



《大元混一圖》

再如上文提及的《大明輿地圖》。需要注意的是，上文對這幅地圖摹繪年代的判斷只是時間的上限，該圖也存在清末民初書商在帶有康熙年號的紙上摹繪，由此冒充早期版本以謀求高價的可能。

當然，上述幾例還只是一些推測。下面舉出一些確實的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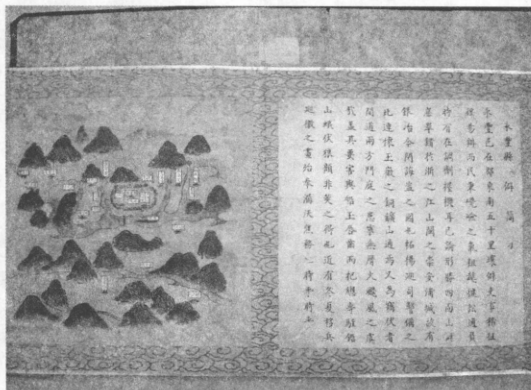
如任金城在《廣輿圖在中國地圖學史上的貢獻及其影響》一文中指出，由於《廣輿圖》嘉慶四年（1799）的“刻印只是照萬曆本翻刻，所以內容與萬曆本全同。正因為如此，有的書商便將章學謙的序撕掉，冒充萬曆本”^⑩。

更為典型的是日本神戶藏《江西輿地圖說》中的《永豐縣圖》^⑪。其中圖說的文字部分如下^⑫：

永豐縣 僻簡□（筆者注：《江西輿地圖說》為“次淳”）

永豐邑在郡東南五十里，壤僻吏事稀，征徭易辦，而民乘（筆者注：《江西輿地圖說》“乘”為“稟”）饒險之氣，粗武健訟，逋負時有，在調劑握機耳已。論形勝，四面山崖崛起，錯於浙之江山，閩之崇安、浦城。故有銀冶，今閉，誨盜之囿也，柘陽巡司警備之。北連懷玉（筆者注：《江西輿地圖說》“懷玉”為“懷”）^⑬，徽之銅礦山通焉，又為竊伏者間道，兩方門庭之患，寧無厝火飈風之虞哉。蓋其要害與鉛玉唇齒（筆者注：《江西輿地圖說》“鉛玉”為“鉛山”），而把

總專駐鉛山，蛾伏狼顧非英之得也。近（筆者注：《江西輿地圖說》為“傍”）有冬夏移兵巡徼之畫，殆奉（筆者注：《江西輿地圖說》“奉”為“捧”）漏沃焦務□（筆者注：《江西輿地圖說》為“也”），時乎時乎。



日本神戶藏《江西輿地圖說》中《永豐縣圖》

按明清時期，永豐縣有二，一在明代江西吉安府，即今天的永豐縣；一在明代江西廣信府，清雍正九年（1731）改為廣豐縣，即今天的廣豐縣。由文中“錯於浙之江山，閩之崇安、浦城”來看，此處的永豐應位於福建的崇安、浦城和浙江的江山之間，因此似應該是廣信府的永豐縣。再加上這段文字與《紀錄彙編》本《江西輿地圖說》中“廣信府·永豐縣”條中所記內容基本相合，因此，我們完全可以肯定此段文字所描述的是明代江西廣信府的永豐縣。

但奇怪的是，圖中繪製的內容與明代廣信府永豐縣的資料完全不合。嘉靖《永豐縣志》卷二“公署”記：“布政分司在縣治西”^⑬，而圖中布政分司卻在縣治東；同書卷三“祀典”：“城隍廟在縣治西”^⑭，而圖中城隍廟則在縣治西南；同卷“風雲雷雨山川壇，在縣治南一里”^⑮，而圖中則在縣治西。另外圖中三處巡司：層山巡司、沙溪巡司、表湖巡司，在廣信府永豐縣的相關資料中毫無踪跡可尋。而圖說部分所提到的有重要意義的“柘陽巡司”在圖中卻毫無表示。當我們查閱吉安府永豐縣的資料時，却發現其內容與這張地圖基本吻合，參見表1。因此可以斷定，這幅地圖所繪為江西吉安府的永豐縣。

表1：明代吉安府永豐縣的資料與《江西輿地圖說·永豐縣圖》的對比

| 明代吉安府永豐縣的文獻資料 | 地圖內容 |
|---|----------|
| 《嘉慶重修一統志》記儒學：“在縣治西南。” ^⑯ | 儒學在縣治西南 |
| 《嘉慶重修一統志》：“層山市巡司，在永豐縣東南一百二十里。” ^⑰ | 層山巡司在縣東南 |

(續表)

| 明代吉安府永豐縣的文獻資料 | 地圖內容 |
|--|-----------|
| 《嘉慶重修一統志》：“沙溪市巡司在永豐縣南一百六十里，近鳳凰山”。 ^③ | 沙溪巡司在縣南 |
| 《嘉慶重修一統志》：“表湖市巡司，在永豐縣南二百餘里。” ^④ | 表湖巡司在縣東南 |
| 《順治》《吉安府志》：“湖西道在治東南一百步。” ^⑤ | 湖西道在縣東南 |
| 《順治》《吉安府志》：“各縣厲壇……永豐在縣北三都。” ^⑥ | 厲壇在縣西北 |
| 《順治》《吉安府志》：“各縣城隍廟……永豐在縣西儒學右。” ^⑦ | 城隍廟在縣西儒學西 |

由此可以認為日本神戶藏的《江西輿地圖說》的《永豐縣圖》中的地圖和圖說分別表現的是吉安府永豐縣和廣信府永豐縣，因此非常可能是後人拼接的結果。^⑧就常理而言，明代人應該不會混淆兩個永豐縣；廣信府的永豐縣在清代雍正年間纔改名為廣豐縣，因此清前中期的人在繪製（或者造偽）時犯這種錯誤的可能性不大；最有可能的情況就是清末的書商為了牟利，在有意偽造或者摹繪這一明繪本地圖時混淆了兩個永豐縣的資料，此後該圖輾轉流傳到了日本。但是，如果沒有這一疏漏，我們難免會將其判斷為明繪本地圖。^⑨

綜上來看，在今後研究中對於地圖表示時間的判定要極為小心，而且不能按照現代地圖的要求來考訂傳統輿圖所表示的時間，否則很有可能陷入各種矛盾之中。而對於地圖繪製時間的判斷則更要小心，地圖所表示的時間很可能不等於地圖繪製的時間。此外，還應當注意以往忽略的地圖作偽的問題。除了上文所舉的例子，在近年來中國傳統輿圖逐漸受到追捧之時，摹繪古代地圖或者在古代地圖基礎上進行某些修訂，將其繪製時間提前，然後出售牟取暴利的情况可能會越來越多，如上文提到的《廣輿圖》。還有《地圖》上刊載的《終於見到贗品老圖了》一文中提到的《大清天下中華各省府州縣廳分布全圖》。^⑩這一地圖繪製於乾隆二十五年（1760），但曾於光緒三十三年（1907）重印，兩個版本中都有對應的表明繪製年代的題記。該文作者當時在幾個古舊書市場多次見到了帶有“乾隆二十五年”題記的這一地圖，因此對該圖的真偽產生了懷疑。實際上，該版的《大清天下中華各省府州縣廳分布全圖》中“濟寧府”的“寧”字用的是“甯”而不是“寧”。這顯然是避清朝道光皇帝旻寧的諱，因此雖然地圖上標有“乾隆二十五年”字樣，但該圖最早也是道光以後繪製的，很可能就是光緒版的。顯然最近市場上這一地圖的大量出現是近年書商為了牟利造偽的結果。

當然那些確知源自於如軍機處、內閣大庫等清廷藏圖機構的地圖應當基本上不存在真偽的問題，而那些收藏在海外和私人藏圖者手中的傳統輿圖往往都需要進行辨偽。就造偽的難度而言，大致可以分為以下三種情況：

1. 最容易識別的是偽造地圖，也就是根據一些資料憑空繪製的古地圖。偽造這種地圖的難度非常高，需要極為全面的歷史和歷史地理知識，因此很難做得十分完善。如前一段轟動一時的《天下全輿總圖》，圖中絕大部分的文字注記都存在史實問題。此

外，該圖的製圖方式也不屬明代中前期。這類偽造的地圖，對於稍有歷史常識和掌握中國地圖史的人來說，應不難識別。當然嚴格意義上，這類地圖並不能歸類於“偽本”，而是“偽書”。

2. 最為常見的是在某些古地圖的基礎上進行加工，將其繪製時間提早的作偽方法。比如前面提到的《大清天下中華各省府州縣廳分布全圖》、《廣輿圖》等。這類造偽大致只能對圖幅以外的文字注記進行掩飾、修訂；如果要對圖中內容進行全面的修訂而不露任何馬脚，不僅需要全面的知識，而且技術難度也很高。要識別這類地圖，則需要掌握一定的歷史和地理沿革的知識。

3. 辨偽難度最大的就是有着良好做舊技術的古地圖的複製品。從造偽者的角度考慮，複製清代光緒之前、尤其是嘉慶之前的地圖，固然價格可以賣得很高，不過由於這類地圖存世極少，一旦面世，必然吸引眼球，但如果複製數量太多，很快就會被識破；而複製太少的話，成本上則不划算，因此，可以推測嘉慶之前的地圖應當不是造偽者關注的焦點。可以猜測，今後市面上大量出現的作偽地圖應當是清代後期的地圖。對於這點，正如《終於見到贗品老圖了》一文所說，如果市面上同一種地圖突然大量出現的話，還是不要購買為宜。

上述三點只是一些粗淺的認識，如何辨別這些地圖，應當是今後中國古代地圖研究中需要解決的問題。最後需要提及的是，“偽本”地圖並不等於沒有價值。如《大明輿地圖》至少可以使得我們確認彩繪本地圖與刻本地圖之間並不只是單向的摹繪關係，刻本地圖也可以摹繪為彩繪本；日本藏《江西輿地圖說》雖然可能是清末摹繪造偽的，但其原本則可能是明代的，因此也具有相應的史料價值。

注釋：

① “偽本”一詞借用的是古籍版本的概念，大致就是由書商加工，企圖以假亂真，以新冒舊的版本，並不是偽造的“偽書”，而是根據已有版本的作偽。如姚伯岳《版本學》中的定義是“所謂‘偽本’，是指圖書在抄、刻製成後在其上製造各種假象的版本。偽本不同於偽書，不是在書名、著者及圖書文字內容方面作偽，進行篡改以提高某書的價值；而是側重於在圖書的某一具體版本上做手脚，使人對其版本情況得出錯誤的結論，以便抬高其版本價值，牟取暴利。”（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197頁）嚴佐之《古籍版本學概論》中的定義是“偽本是指那種經營時代書商做過手脚，加工作偽，企圖以新冒舊，以次充好，以假亂真的版本”（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年，第148頁）。

② 李孝聰：《歐洲收藏部分中文古地圖敘錄·前言》，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41—43頁。

③ 某些地圖雖然標明了繪製時間，但依然不完全可信，存在後世摹繪、篡改的可能。

④ 李孝聰在《美國國會圖書館藏中文古地圖敘錄》（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5頁）中對其有着如下描述：

“明朝中葉（1536—1573），絹本色繪，18幅地圖，疊裝成冊，每頁圖幅75×84厘米。

“該圖用形象畫法，按明代二直隸、十三省分幅，各具圖題，描繪明王朝的疆域、政區、山川形勢以及周邊國家與地區，未繪出臺灣。首頁“輿地總圖”畫方，每方500里；其餘各圖不畫方，圖序為：北直隸、南直隸、山東（二幅，一幅為遼東）、山西、河南、陝西（陝、甘各一幅）、浙江、江西、湖廣、四川、福建、廣東、廣西、雲南、貴州。用統一的圖例符號分別表示府、州、

縣和土司所統縣的治所。”

- ⑤⑥ 李孝聰：《美國國會圖書館藏中文古地圖敘錄》，5頁。
- ⑦ 查程峻僧，可能即程嵩齡，字峻生，號峻僧，祖籍安徽休寧，應宣統己酉科考得授巡檢，愛好搜集古物，著有《獲室泉幣考》、《獲室詩文存》等，1951年75歲時去世。“乙酉”年，道光之後有三，即道光五年（1825）、光緒十一年（1885）、1945年；又程峻僧於1951年75歲去世，生年應當為1876年，由此來看，前兩者都存在問題，“乙酉”年很有可能是1945年，且題識中“方今臺灣收入版圖”也似乎暗示了這一點。
- ⑧ 比較典型的就是一段轟動一時的《天下全輿總圖》。
- ⑨ 任金城：《廣輿圖在中國地圖學史上的貢獻及其影響》，曹婉如主編：《中國古代地圖集（明代）》，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77頁。此外，任金城還指出，“但仔細注意也不難發現，此版中把萬曆年號因避乾隆帝諱都印成萬歷，這是鑒別真偽的重要標志之一”。
- ⑩ 感謝李孝聰教授提供該圖的照片。
- ⑪ 原文中模糊的部分用《紀錄彙編》中收錄的《江西輿地圖說》進行補充，並進行對校。（明）趙秉忠：《江西輿地圖說》，《叢書集成新編》第九十四冊，據沈節甫輯《紀錄彙編》本影印，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第613頁。其中沒有圖，只存文字部分。
- ⑫ 按《大明一統志》卷五十一《廣信府》：“懷玉山，在玉山縣北一百二十里。”（三秦出版社，1990年，第810頁）永豐縣在懷玉縣南，因此懷玉山也在永豐縣北。因此，此處應為“懷玉”。
- ⑬（嘉靖）《永豐縣志》卷二《公署》，《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第三十九冊，上海古籍書店，1982年。
- ⑭⑮ 同上卷三《祀典》。
- ⑯《嘉慶重修一統志》卷三二七《吉安府·學校》，中華書局，1986年，16336頁。
- ⑰⑱《嘉慶重修一統志》卷三二八《吉安府·關隘》，16383頁。
- ⑲（清）李興元修，歐陽主生等纂：（順治）《吉安府志》卷十四《建置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232頁。
- ⑳同上，卷十五《祠祀志》，247頁。
- ㉑《江西輿地圖說》中另有吉安府下屬永豐縣的記載，其與該圖的記載相合。
- ㉒地圖中可以用來推定時間斷限的要素是城門的數量。（光緒）《吉安府志》：“紹興七年縣令李譔築建土城，高四尋，周千丈……南北二門……明宏治初知縣李梁因故址築城，門四座……正德六年流寇破城，知縣錢季王興築，尋潰於水。嘉靖三年知縣商大節加築，開六門”（劉鐸：（光緒）《吉安府志》卷六《建置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第251頁），圖中所繪城有四門，因此可以斷定地圖所表現內容的時間上限是弘治初（約1488），下限是嘉靖三年（1524）。
- ㉓楊浪：《終於見到贛品老圖了》，《地圖》2011年第1期，138頁。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